

## 春日碎语

刘凤斌

又见春雨，又是料峭，总有一些特别的情愫，缠绕着我们。让我们牵挂的，或许是身边的你，或许只是某个陌生的“你”，甚至，只是某个时间里匆匆掠过的背影。

日子在交织着泪水和欢笑中匆匆流逝，日子也在交织着担忧和希望中匆匆走来。无论这日子曾经多么不平常，走进寻常百姓家，它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而平平常常的日子，也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，哪怕是弱小者的生存，也和“强”字分不开。活着，就意味着生之顽强。

抬头望见天上月色冷，眼前星星点点的光亮却扑了我们烟火满怀，微风阵阵赶赴，挟香而来，忽觉花渐开，春已归。四季起起落落，朝朝暮暮，我们总乐意途经一些山川湖海和花花草草。毕竟，我们有自己要走的路，也有自己要做的梦。

城市已满目绿色，街旁也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在有风的日子，纷纷零落，碎在匆匆的行人身上，仿佛春天的雨，这一刹那很美，却也无可避免带来扰乱和不安，春日里潦草的，需要偶尔停驻，理清游走在记忆的时间，往昔对永恒的追求渐渐凋零，我又该如何留住你呢？

也许我们还记得，那个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，已悄然离我们而去。我们自以为饱经沧桑，阅透了人生，心早已磨出厚茧，可是，一篇朴素的文章，一

段质朴的对话，一个感人的细节，便足以令我们鼻子发酸，心头发烫。我们的心从来都不是荒芜的一片，那光明的一隅，会永远充满温情。

当伟大成为我们习以为常时，我们的心又何时充满温情？我们应当把永远的尊敬留给他们。

走过的岁月，有梦圆的欢欣，也有梦碎的痛苦，而执著于梦想的追求，使我们天涯咫尺，息息相通。

不必着急赶路，时间对于我们来说，像是暂停了几年，往后每一次岁月的更迭都有如幻影，历史与时光如冰雪般落地又化为乌有，四季虽长，却始终有些褪不去的暗，荒芜的路走到尽头，熙熙攘攘俗世烟火，黄昏的笙歌四起，它终将消弭却也灿烂无比。

当我们的心灵开始照耀着一种特殊的阳光，那就是理想和希望。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理想没有希望的日子，就如同我们无法想象没有阳光的日子一样。正因为有了阳光赋予生命的作用，地球才没有变成石头。莎士比亚告诉我们：“草木是靠上天的雨露滋长的，但是它们也敢仰望穹苍。”而在穹苍之上，“同一个太阳照着他的宫殿，也不曾避过我们的草屋。”

迎着初升的太阳，我的朋友们，我们同行。

希望从来也不抛弃我们，希望就是我们自己。

巴建华

在移步换景、满目皆春的黄海国家森林公园，党建工作展览馆大厅内第一幅展板展示了东台林场组建时53岁的李汉玉书记和35岁的巴益宏副场长见面时的一段对话，不禁使我回忆起半个世纪前父亲在盐碱滩上植树创业的岁月。

1965年，东台林场成立，父亲巴益宏调任林场行政副场长。他和李汉玉书记两人一起带领开拓者担负起艰难创业的历史重任。

听说召喚舍己为公  
沙滩盐窝安营扎寨

1965年9月，父亲从三仓公社团委书记升任为副社长，年轻、干练，前程看好。七个月后，父亲突然接到组织上一纸调令，调他到离家几十里地的黄海之滨，在一望无际的沙滩上组建国营东台县林场。如今那里已成为绿树成荫的黄海国家森林公园，而当时却是海边的不毛之地荒沙滩，哪里有一棵树的踪影！

接到调令后，不少同志劝父亲，这海边是个“十里不见人，晴天冒盐霜，雨水汪汪”的人迹罕至的高盐高碱的不毛之地，草都不长的盐碱沙窝焉能种树？老一輩人为父亲此番赴任能否担负重任捏一把汗。更有朋友上门劝说，为什么你米缸不踹往糠筐里跳？不但耽误了自己的大好前程，而且拖累了你的家庭。你看你家里5个小孩，个个要人照护，你还有一个患腰腿炎、弯着腰走路的老母。老老小小六口之家就靠你爱人一个人支撑？

父亲坚定地认为，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要对党忠诚，党叫干啥就干啥；能不能种上树，试了才知道；只有没志气

## 为盐碱地换上“绿装”

——追忆亲爱的父亲

的人，没有办不成的事。他简单安顿了一下家庭，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。

半个月后，18名职工到齐，人员到了，首先得解决住的问题，没有房屋，只得临时借住在草荡管理所。父亲和李书记把18名同志带到正在规划的二区，指着一片荒芜的盐碱地说：“我们要在这里建林场的场部。”刹那间，十几个人目瞪口呆：“这难道就是我们日后的安身之地？”父亲鼓励大家：“俗话说，‘眼怕手不怕’，困难是弹簧，你弱它就强。我们是林场的开拓者，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，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！一张白纸没有负担，可写最新最美的文字，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在共产党领导下，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！”

父亲在大家面前庄重承诺：“种不活树，我决不离开这儿！”他勇于担当的精神鼓足了林工兄弟的士气。

现场动员后，林场干部职工每天往返于东台河闸与场部之间搬运建筑材料。同时，他们自力更生，就地取材，土法上马，经过20多天的激情奋战，便盖成了8间砖墙草顶的场部，大体分为食堂、职工宿舍、干部办公室兼宿舍（用芦苇篱笆一隔，内为宿舍，外为办公室兼会议室和接待室，被戏称为“多功能宿舍”）。就这样，他们硬是在海滩上安营扎寨。

国营东台林场在没有仪式、没有掌声和鞭炮声中悄然诞生。

反复试验科技攻关  
治盐改碱种树植绿

父亲为了履行向党和人民立下的铮铮誓言，建场伊始，就摸索怎样种树，他整天在茅草窝里转，看看这，量量那，天气炎热且先不论，光是蚊虫叮咬就让人吃不消。

每每在草窝里走一趟，身上就被咬得大泡小泡，不管天气怎么热，都得长裤长袖全副武装，何况是成天泡在草窝！这样苦苦干了一年，试种了三五种树，基本上没成活。

有些人说起了风凉话：“重盐碱地植树，无异于痴人说梦……”，传到父亲耳朵里，他想：难道盐碱滩真的不能植树吗？我就不信这个邪。父亲认为，只有用科学精神治盐改碱，反复试验，不断探索，不可能终将成为可能。白天他带领攻关小组进行实际试验，晚上挑灯夜战找资料学理论。干部、职工试栽的不同树种一批又一批地被盐碱烧死时，有些同志产生了动摇情绪，但父亲毫不气馁，屡败屡试。

凭借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，父亲参照三仓公社新五大队改碱种棉的经验，一方面征得县领导同意，请求各公社抽调民工帮助林场挖沟、挑河、开埝、夹碱，一方面他亲自带领部分职工成天整地、放样、开穴、起苗、栽植，每道工序都参与并跟踪；每逢风雨，不分昼夜，人家往屋里走，他却往风里钻，因为他要观察记录苗木抗风雨情况。

盐碱绿化最大的障碍是土地含盐量大，树木难以扎根，如何根据不同的含盐量选择适合的树种？父亲带领攻关组人员用开槽、布沟、截渗、淋层、盐土处理、灌溉洗盐等方法来调节改良土壤，终于筛选出了耐盐抗碱的本地树木——钉刺槐，并在两块地试种。

1966年夏季的一天，台风来袭，他冒着大风在试验林地里扶苗、踩实、放水，几乎忙活了一夜。台风过后，两块地的钉刺槐因及时扶正加固，没有发生次生灾害，形成了两片绿色的小树林，试验成功告捷！林场人兴奋了，可父亲没有停步，打这以后，试验的树种不断增加，范围不断拓展，水杉、意杨、银杏等树种也在盐碱地上扎下了根。

父亲在林场坚守的17年中，在困难和挫折面前，在公私面前，在时尚面前，在跟风面前，东台林场“以林为主”的大方向始终没有变，“林木”的魂没有丢，走向森林的路没有偏移。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”，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接续奋斗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，林场的绿色植被（树种）每年以几何级数增长，昔日荒无人烟的盐碱地换上了崭新的“绿装”。

1982年，因工作需要，父亲从林场书记兼场长的岗位上上调任新农公社党委书记。临别时，父亲注视着那片热土，几多眷恋，几多不舍！

2010年父亲一病不起，他在病榻上深情地说，林场就像我们的孩子，十月怀胎的辛苦，出生时的难产，成长时的多灾多难，走到今天，实在不易，怎能不怀念？小时候我们做保姆；现在会走路了，我们也离开了。事业就是这样，要一代接着一代干，一代带着一代干，一代做给一代看。今后有时间常带着孩子们去林场看看，它是我与一群林场开拓者们，在党的领导下倾心打造的，它虽然不属于我个人，但我们这代人毕竟用汗水浇灌过……”
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艾青的这句诗，准确地表达了父亲和他们那一代老林工的心声。

附记：东台林场现已发展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人造生态林园——黄海国家森林公园，2016年10月正式获批国家4A级旅游景区，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，林场党总支被表彰为“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”，“艰苦奋斗、科学求真、守正创新、绿色发展”的黄海林工精神已深植在那片沃土，日益深入人心，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。谨此告慰我亲爱的父亲。

## 母亲的遗嘱

鲁锦虹

今年2月21日，我的母亲周似兰在家中安详去世。九十多岁的高龄老人故去，子女本不该过度悲伤。然而，当我翻出几年前母亲写好的遗嘱时，心情却久久难以平静。

1933年，母亲生于上海浦东黄浦江畔董家渡。1945年春天，母亲进入上海第三火柴厂做工。同年秋，日本侵略者投降，抗战胜利，母亲跟随在上海做工的父母回到苏北老家——紫阳县鲍庄乡（今溱东镇鲍庄村）。外公回乡后，参加革命，先后任溱东区三乡农会主任、乡水利组长、渡江支前中队队长等职。母亲在外公引领下，也参加了动员青年参军及各项支前活动。

1949年10月，能歌善舞、念过私塾的母亲，被乡干部聘请担任冬学老师，教农民识字唱歌。不久，母亲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任鲍庄乡团支部副书记、乡妇委会主任。

1954年冬天，母亲与父亲结婚后，来到父亲的家乡溱东区北陶乡（今时堰镇陶庄村）。母亲在动员乡民向国家交售余粮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勤奋工作，1956年，母亲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先后任北陶乡团支部副书记、乡高级农业合作社副社长、乡幼儿园园长等职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大潮中，父亲被下放生产队种田。母亲同时被革去幼儿园长职务，回乡务农。

“文革”中，母亲被勒令退党。母亲坚决不从，说，我进了党组织的大门，就永远是党的人！

父母均不会种田，在农村生产队劳动，只能做一些副劳力的农活，拿不到大工分。一年劳动下来，工分累计领全家粮草也不够。为了让我们兄妹吃饱肚子，母亲起早带晚去荒田挖野菜，炒熟后拌和在粥中吃；去泥滩上拾田螺，给我们补充营养。在家庭极端贫困的环境下，母亲养成了勤俭持家的生活习惯。全家人身上的衣服，母亲补了又补，缝了又缝。

后来，父亲恢复公职，离休后家庭经济条件得到很大改善，母亲依然保持缝补衣服的习惯。甚至在她临终前一个月，还穿针引线，为自己缝补袜子和衣裤。

母亲对我们兄妹四人很严格，教育我们从小要遵章守纪，奉公守法，长大后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对社会对家庭有贡献的人。我做教育工会工作后，母亲依然不断提醒我克己奉公，多为教职工办实事。她担心我在经济上犯错误，不时用一系列的贪腐案例教育我勤政廉政，说，我们家从困难中走来，人不能忘本，说，碗外的吃食再好，一口也不能吃！

在母亲言传身教下，我和我女儿均早早加入党组织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我将年迈的母亲和离休的父亲接到县城生活。我建议母亲连同党组织关系一并转来县城居委会。她不同意，说自己党组织的根在老家。

母亲只念过几年私塾，文化水平不高，然而，她特别爱学习，爱看书读报。家中订的《扬子晚报》《东台日报》，她每天必看，重要新闻还抄写下来，晚上给我们兄妹看。

2019年春天，母亲生病住院前，突然把我叫到她跟前，拿出一个包裹严实的纸包，让我打开。我打开后，发现是一张用毛笔写的遗嘱和2000元钱。她说如果病魔不好，要我代她缴最后一次党费。

那次病愈出院，她除了要我替她保管遗嘱和党费外，还督促我每年及时为她去老家缴党费。

母亲没有工作，没有退休金，她的钱，是父亲给的零花钱，她一点一点积攒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还想着为党再作一点自己微薄的贡献。母亲在遗嘱中说“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”，她要求我们永远跟共产党走！

陶庄村的党组织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后，村两委班子亲自专程赶来县城吊唁。我将母亲的遗嘱和2000元党费递给村领导时，在场的人无不被母亲对党的忠诚所感动。



春的召唤

## 清明尤念远行客

周稀银

续地说“要走了”，“要走了”……我和岳父值守，慌忙叫醒半夜换班的妻子和他哥哥，来不及叫“脚班”的人，就在我们手忙脚乱地给岳母穿寿衣时，电灯突然灭了，岳父喊着妻子去拿火油灯，惊慌失措的妻子居然把灯罩摔在地上……当夜我和妻儿到大姨家报丧，大姨还没等我们说话，就“哇”的一声哭嚎：“妹子啊，你昨天还不让我走，说你要走了，我怎么就没信呢？”岳母在养病期间，常跟邻居说起她的病好不了了，但明白无误地告诉亲人她离世的日子，至今我也没弄清楚其中缘故。或许死去已无可选择，但这样的死亡时间“选”得如此分明，怎不令人慨叹与伤痛？

与岳母英年早逝带给我们的无尽伤痛相比，奶奶的逝世似乎没有想象的那样悲伤。那是一个夏天，上午接到四叔托人打来的电话，说奶奶不行了，赶快回来见上最后一面。我接到哥哥后，两人飞也似的回到四叔家。此时，长辈们纷纷到齐，作为孙辈还是我们先到了。在奶奶地铺前蹲下，四叔和四

婶叫着奶奶：“你两个孙子来了”。我和哥哥分别抓住奶奶的手，都感到了奶奶的“紧握几下”。中年便已眼瞎的奶奶显然无法与我们见上最后一面，但她走得十分安详。也就在前一夜，“灯油”已近耗尽的奶奶，还跟四叔长谈了半夜，回顾了地近一个世纪的跌宕人生。奶奶以94岁的高龄成为我们家族里最长寿的人，而“凡事乐观”成了她的精神遗产。

父亲离世始料未及，连他自己都未有预感。或许是不听家人劝阻，前一天还在地里拔了黄豆，就在上午起床时突然“软”了下来。我接到三姐的电话，飞速到家，只见父亲瘫坐着，三姐和母亲左右搀扶着，不敢再动。我一边慌乱地抱起他，一边嘶喊着他试图唤醒……三人惊慌失措地将父亲抬到躺椅上，盖上毯子。当哥哥回来时，父亲已经完全没有呼吸，而他没留下任何遗言。也就在几周前，父亲还在期待着他朝着百岁进军，不曾想却止步于92岁。这个曾经出国作战隐居乡野60余载的志愿军老

兵，以这种方式与亲人告别，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尽管已有先例，但真正到了照料母亲临终时刻，却还是惊魂落魄，无法接受。母亲的“三高”并发症，加上她又是第三次中风，已然让她的生命进入倒计时。尽管知此“天命”，但我们兄弟姊妹五人还是在老屋全力守护，日夜陪护。正月二十三上午，母亲的脸色突然难看起来，喂口水也会吐出来。有邻居劝我们该“动地铺”了，但谁也不敢下这个“命令”。当母亲再次出现呼吸窘迫时，才被慌慌张张地抬到地铺上……母亲走得虽令人揪心，但昏睡中都想到不给予女添麻烦。上世纪五十年代与父亲结合并随军8载，跟随父亲复员返乡生活60余载，母亲就这样告别了她89岁的人生，却也是尊严地离开的。

“青青陵上柏，磊磊涧中石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”。先人们的陵墓上柏树青翠，或绿植环绕，他们已是远行匆匆的过客，但却永远活在后人的心中。